

巨變的十年

青峰

目前中國各大城市的精神生活十分匱乏，因此必須重視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方面的問題。缺乏自由的氣氛，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是很難提高的。在這一點上，今日中國與改革開放的形象是很不相配的。不能容忍批評的政府，它的體質必定虛弱；靠着軟弱馴服的人民，終究無法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青峰來電話，提醒我《二十一世紀》已屆滿十周年。在香港這個商業氣氛濃厚，文化氣氛淡薄的小社會，一本高水準的大型雜誌，在經濟困窘的條件下，竟然挺過十年，主持人陳方正兄和青峰、觀濤暨其他工作人員長期所付出的心血，以及為中國文化的建設所表現的那份強烈的使命感，實在令人敬佩！

從1990到2000年這十年中，中國的兩岸三地都起了巨大變化，《二十一世紀》恰躬逢其盛，扮演了歷史見證者的角色。這一角色不只是對將來研究這段歷史的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對當代知識份子也起了引領風騷的作用。

就香港而言，這十年中最大的變化自然是中國收回香港。收回本身這件事，不過是結束中國人的恥辱，我們關心的，是為了收回香港，在制度上的創新構想。這方面我完全同意陳方正兄在〈從「一國兩制」看二十一世紀〉一文所說：「『一國兩制』的意義其實遠遠超過它所解決的香港回歸這一現實政治問題；而且，它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重要性，也許是設計和推行這一制度的人所還未曾完全意識到的。」除此之外，在我看來，這一制度上的創新構想還有一重要的意義，就是突破了中國幾千年來「天朝型的世界觀」，使「天朝」認識到中國的邊陲地區，也能創造出高於中原的價值，並回饋中原。

在中國歷史上，香港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1932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演講，已慨歎英國竟把這片小荒島建設成現代化的商埠。假如孫氏能看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被世人目之為「東方明珠」的香港，其金融業之發達幾可與紐約、倫敦、東京並駕齊

在1991年2月夏威夷會議上，右一為章政通，左一為傅偉勳。



驅，真不知又將發出何等的驚歎！正因為如此，所以當「九七回歸」前後，香港未來的命運一時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無可諱言，世人（尤其是台灣）對「一國兩制」下所作的「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確存有相當大的疑慮。因回歸引發的香港內部的信心危機，如北京當局對港府的強勢態度不能收斂，這樣便很難解除心理上的焦慮。進入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的統一問題，必將成為世人關注的又一焦點，香港「一國兩制」的成敗，嚴重關涉到兩岸統一的進程。

這十年中，台灣最大的變化是政黨輪替。號稱歷史超過百年的中國國民黨，1949年被中共奪取政權，流亡到台灣，2000年又被民進黨擊敗，不論國民黨如何腐敗，也不論台灣的民主是多麼的不健全，政權能經由選舉和平轉移，總是為中國政治史的發展立下新的里程碑。

國民黨雖然失敗，但無人能否認過去五十年它在台灣的成就。不客氣地說，就是因為它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才免於「不斷革命」之禍，憑着中國人自己的才智，開創了一個多元自由的社會。香港與台灣例子，應該很有力地反證了中原文明確實涵藏着妨礙中國邁向現代化的不利因素。鄧小平排除萬難，堅決推動改革開放的政策，我相信其中一部分的動力是受到香港與台灣成就的刺激。

目前台灣社會治安惡化，拼裝車式的新政府上台，還在蜜月期，民調已下滑。由於前總統李登輝的私心自用，一再修改憲法，使一部原可把社會導向長治久安的根本大法，如今卻成為政治、社會的亂源。

當前台灣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來自中國求統的壓力。自1987年台灣對大陸採行開放政策以來，大概誰都沒有料到，每年往來於兩岸的人以百萬計，可是在社會心理上卻漸行漸遠！造成此一現象，雙方都有責任，都有問題。大陸方面的問題是姿態過高，缺乏寬容，對台灣一百多年來充滿悲情的歷史尤其缺乏設身處地的了解。台灣人的普遍心聲是：一百多年前，中國不要我們，就任意拋棄，現在我們經過一百年千辛萬苦的努力，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比你強，如今你想收回，那有那麼容易。台灣方面的問題是坐井觀天，把自己的命運寄託於美國的支持。

未來兩岸的統一問題如何解決很難預測，我的看法是，兩岸問題既是由長遠歷史形成的，要解決它就必須有耐心，只要中國經濟繼續發展，接下來認真從事政治改革，使大陸的精華地區在各方面的水平與香港、台灣接近，對問題的解決便可收水到渠成之效。萬一不幸必須訴諸戰爭的方式，那不只是台灣，連同大陸，都將是中國人民的又一場浩劫！

在這十年中，中國最大的變化，是由十一年前天安門的悲劇中重新站了起來，令世人刮目相看。經濟方面的快速成長，精華地區的現代化建設，真是一日千里，但嚴峻的挑戰才剛開始。中國既日漸融入國際社會，那麼她就很難長期躲避而不面對國際普遍認同的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更何況，這些價值本來就是百年來孫中山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一直追求的目標，不能說是由外面強加於我們。依據台灣民主發展的經驗，我實在不敢想像，中國一旦進入民主時代會是怎樣的景象。我的建議是，在已發展的精華地區實施局部的民主，等到將來那些落後地區的民生、民智問題提昇後再逐步推廣。海內外熱切盼望中國

早日民主的人士一定要知道，民主建設要有成效只能漸進，不能急躁。民主建設的難度遠高於革命，當年毛澤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急躁心態，帶給中國人民的巨大災難，這個教訓我們不應該忘記。

今日中國經濟能快速成長，與二十年來不斷開發經濟特區有莫大關係。快速成長，也會很快遭遇到發展的瓶頸。因這些特區已造就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他們原先的創意已漸趨僵固，削弱了應付挑戰的能力。不只是在經濟領域，在政治、社會方面，也都產生了類似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必須吸取新觀念，運用新方法，採取新步驟，真正用心在各領域去建立能促使不斷更新的機制。建立這種機制最主要的條件，是權力分散、下放，提昇各自的自主權，因為只有在能獨立做決策的單位和組織裏，革新的觀念才有機會湧現。

目前中國各大城市的建築物越來越大，但精神生活卻十分匱乏，這本是邁向現代化的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因中國改革開放的步調很猛，使物質與精神的失調格外嚴重。因此必須重視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方面的問題，使那些在市場經濟中淪為弱勢群體的人文學者和人文知識份子，也有發揮他們才智的空間。富有獨立性和創造力的人文人才，對物質的需求並不高，他們最需要的是研究和發表的自由環境。缺乏自由的氣氛，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是很難提高的。在這一點上，今日中國與改革開放的形象是很不相配的。

不能容忍批評的政府，它的體質必定虛弱；靠着軟弱馴服的人民，終究無法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韋政通 台灣中國思想史學者

讓讀者成為公眾

徐賁

「讀者」是一個消費概念，而「公眾」則是一個社會概念。前者牽涉到的是流行或暢銷，後者則是問題探討和共識形成。任何特定的刊物公眾都只是相對於其他特定公眾而言的，即便與普遍公民社會問題相當貼近的公眾也不是「普遍公眾」的代言人。他們的社會作用不在於設計某種宏大圖景，而在於以其關心問題的特定方式來幫助形成民主的、理性平等的公民社會規範。